

引 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史学遗产，源远流长。近代史学继承了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但由于时代的激荡，又产生许多不同于古代史学的特点。

中国近代史学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社会在变，风气在变，思想在变，中国经受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巨劫奇变。历史学家们已经不可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坐在书斋中优哉游哉地神游于历史的书海丛编之中了。他们必须面对现实，考虑国家民族命运，迎接外来世界的挑战，调适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接受心态，旧学新知有机融和，挽救国家，从历史中找出能使祖国走上富强之路的千古良方。

中国近代史学的第二个特点，是与外部世界紧密关联，始终受到国外理论思潮、历史著作的影响，采用了新理论新方法新思维，传教

士和翻译家们起了重要作用。

近代以前，中国历史学一直处在封建社会形态中，人们把它叫做“旧史学”。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冲击和挑战，中国社会在应付冲击和挑战的背景下，整体社会形态发生变化，历史学也随之改变，近代意义上的历史学随之产生，人们把它叫做“新史学”。

“新史学”既是旧史学的延长和形态改变，也是西方冲击的产物。从这个时候开始，历史学从“历史哲学”到编撰理论，都增加了许多旧史学不具备的内容，许多西方的历史著作、历史理念、历史话语，被介绍引进到中国的历史学当中。

中国近代史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大师辈出，流派纷杂，充满交锋。

与源远流长的古代史学相比，近代史学的时间只有一百年，实在“短暂”得很。但是，尽管时间短暂，学者和流派及其交锋的复杂性，却较古代史学有过之而无不及。辛亥革命以前，主要是封建旧史学与资产阶级新史学以及资产阶级改良派史学和革命派史学的交锋，其中又夹杂着经学史上所谓“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的交锋。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各派资

产阶级唯心主义史学的交锋，成为史学发展的主线，其中又有各个史学流派内部的争论和交锋，颇为热闹。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越来越强大，最终成为史学的主干。

中国近代史学的第四个特点，是发现了新史料，产生了现代考古学。

1925年7月，著名学者王国维在清华大学给学生们演讲时曾经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他所说的“新发现”，主要包括五项内容：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新疆各地的简牍，敦煌千佛洞的六朝唐人所写卷轴，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和藏书，各地发现的古代外族遗文。由于这些新发现，使得近代成为“新史料之发现的时代”，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天地。

中国近代史学以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为分界线，走过了两个特色鲜明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以前，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5年甲午海战，是中国史学从封建旧史学中脱胎出来，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时期。甲午以后，经过戊戌变法，到1902年梁启超发表著名论著《新史学》，是资产阶级新史学正式产生的时期。从190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间经过

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史学继续发展并开始分化的时期。五四运动以后，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 20 年代诞生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实验主义史学为代表的新型资产阶级史学取代了晚清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疑古思潮盛极一时。到 30 年代，发生了热烈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实质性的发展。40 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加壮大，成为史学发展的主流。总之，走出封建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基本线索和方向。

一 新史学的开山梁启超

1. 为变革中国现实而研究历史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是今文经学大师、政治改革家康有为的学生，曾经协助老师撰写变法理论著作，跟着老师发动“公车上书”，参加强学会，编辑《时务报》，竭力宣传维新变法理论，与老师并称为“康梁”。但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他很快就超过了落在时代后面不肯前进的“康圣人”。

梁启超号称“中国之新民”，是精力旺盛、充满热情的大政治家，又是学问广博、思想锐利、文风流畅的大学问家。但是，尽管他的学问非常广博，却有一个核心，那就是历史学。

梁启超的历史研究范围，既有中国史，又有外国史；既有古代史，又有当代史；既有通

史，又有专史；既有微观的个案研究，又有宏观的通论性研究；既有理论，又有考据。他是中国近代最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史学家，是新史学当之无愧的开山大师。

梁启超历史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利用历史为他的政治主张服务，充满经世致用的精神。他不是为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为保国保种保教、振奋民族精神、变革中国政治、宣传爱国主义而研究历史。

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就发表过《变法通议》、《古议院考》等大量论著，阐发维新思想，论证变法的必然趋势。

为促动人们对变法急切性的认识，梁启超特意研究了一些国家亡国的历史，告诉大家：要是中国不实行变法，就会像这些国家一样灭亡。1896年，他写了《波兰灭亡记》，介绍波兰一再被瓜分的惨痛历史。1898年，作《俄土战纪序》，指出土耳其所以削弱，原因就是内治不修、外交不慎。以后，他又写了《朝鲜亡国史略》、《越南小志》等，都是想让中国人想一想，这些国家的悲惨历史说明了什么！

梁启超一向重视研究外国情况。戊戌变法前，他曾经编辑32册《西政丛书》，将有关西方政治制度的著作汇编在一起。戊戌变法失败

后，他流亡日本，更拿出很大精力研究世界史。除了研究一些国家的悲惨历史作中国的鉴戒外，还利用外国历史来激发民族精神、宣扬爱国主义。1902年，著《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用意大利爱国英雄的事迹来激发国人的爱国意识。同年，又撰《斯巴达小志》，对斯巴达的贵族政体、军国主义大加称赞。撰《雅典小史》，对梭伦改革予以赞誉。

他还通过研究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史，教育启发人民。1899年，他写成《瓜分危言》，专门讲述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掠夺中国主权的情况。1903年，梁启超游历美国、加拿大，正赶上美国颁布限制华工入境的新法令，排华事件时有发生，于是写了《记华工禁约》，对美国虐待华人的情形作了详细叙述。1904年，又写了《中国国债史》，记载光绪朝中国向英、德、法、俄等国借债的史实。这些研究，都闪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光芒，具有极大的进步性。

梁启超广泛研究了中国历史，同样是为政治服务的。早在1896年，他就写了《古议院考》，说中国古代早就有议院，所以现在开设议院与古代先贤并不矛盾。1897年，作《史记货殖列传今义》，借解说古史，阐述发展民

族工商业的主张，鼓吹通商。1898年，开始发表《戊戌政变记》，以亲身经历记述戊戌变法经过，表扬谭嗣同等爱国志士，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是回忆录式的当代史著作。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于次年宣布预备立宪。梁启超为此发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借着研究古代法理学，提倡法制主义，呼吁制订宪法。他还写了《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借着研究政治制度史，用西方民主自由学说批判中国的专制政治。

在历史研究著作中，梁启超尽量把西方的许多新东西说成是中国古代固有的，以减轻其学说的社会阻力。但是，一些封建顽固派还是对他猛烈打击。1897年10月，他在长沙时务学堂借史学等课程，发挥“民权”思想，遭到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及叶德辉等人陷害，诬蔑他专以无父无君的邪说教育学生，向湖南巡抚陈宝箴递交告状信，要求把他驱逐出境。但是，梁启超没有屈服，而是把进化论作为强有力的工具，指出从上古到今天，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进化的。中国需要变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顽固派一味“守旧”，完全违背历史进化的公理。

2. 史学革命的主帅

1901 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第二年 2 月，又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提出“史学革命”的响亮口号，震动了知识界。梁启超言举世所不敢言，为举世所未尝为，登高一呼，发聋振聩，被赞誉为“思想界之陈涉”。

原来，当历史的脚步刚刚踏进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运动已经汇集成为势不可挡的凶猛大潮。在这种文化范式转型的背景下，史学革命的条件也就成熟了。当时，在史学领域出现了许多新鲜的言论、译文、理论、方法、主张，而梁启超的论著最有名、最有代表性，冲击力也最大。他计划编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中国史叙论》就是这部通史的叙论，《新史学》则是这篇文章的延伸。

梁启超猛烈抨击旧史学，认为从前的历史，仅仅记载有权力的人的兴亡隆替，虽名为历史，实际只是一人一家的谱牒。传统史家有一个非常荒唐的观念，就是认为天下是君主一个人的天下，所以写历史便只写王朝是怎么得来的，是怎样治理的，又是怎样失去的。像二

十四史，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他说，中国旧史有“四弊”、“二病”。

“四弊”是：①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并由此而产生正统观念。②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本纪列传，不过是集合无数的墓志铭而成，看不到群体之间的力智德。③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知有史实而不知有理想，不能究明事件之因果，鉴往知来。

“二病”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往往读尽一卷，却没有一句话具有进入脑筋的价值。能因袭而不能创作，除了司马迁等几位优秀史家，全都庸庸碌碌，因人成事。

鉴于中国传统史学的这些毛病，他断言：“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不救。”今后的新史学，必须能够探索人间全体即国民全部的经历及其相互关系，叙述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的道理，讲述一群人休养生息、同体进化的状况，既有哲学之理想，又有多学科的知识，使读者油然而生爱其群、善其群之心。

梁启超的见解有许多偏激和错误的地方，但在近代史学史上的积极作用却是应该肯定的。时代变，他的思想也在变。20年后，梁启超又发表两部著名作品：《中国历史研究法》

(1921)、《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1927)，继续批判传统史学，但措辞却缓和多了，问题考虑得也更加深入，更加细密。

3. 让历史走到老百姓中去

作为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和主要理论家，梁启超率先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文艺口号与理论主张，而且积极实践，在创作、评论、研究、介绍、宣传、组织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取得了无人能够代替的广泛社会影响和突出的历史地位。与此相适应，他还积极鼓动史学的通俗化，力图让历史走到老百姓当中去。

梁启超之所以这样做，是与他“伸民权”的政治主张和“写民史”的史学思想分不开的。他认为，民权不伸是中国积弱的主要原因，民权有无取决于民智高下，民智开发有待于普及历史知识。他提出，今后写历史，不应写君史和朝史，而应写国史和“民史”。

“民”也叫“群”，就是老百姓，在梁启超的思想体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梁启超提倡史学通俗化、呼吁撰写历史小说，就是为了

开发民智。

1896 年，梁启超提到小说改良问题，主张创作新式小说，代替旧式小说。翌年，进一部重申用小说教育儿童与下层群众的主张。其后，他本人积极实践，翻译了一部当时在日本颇有名气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并写了序言《译印政治小说序》。1902 年 11 月，他在日本主持的（新小说）月刊正式创刊，首创近代的新型小说专刊，成为通俗史学的主要阵地。这本杂志积极利用小说宣传历史知识，设有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哲理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语怪小说、写情小说、外交小说、社会小说、法律小说等栏目。其中历史小说刊载了《洪水祸》、《东欧女豪杰》、《痛史》等作品。梁启超在创刊号上发表著名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直接触发了通俗史学的繁荣。

梁启超说，不管什么人，都喜欢幽默，不喜欢严肃，这是圣人无可奈何的事情。要对老百姓施行教育，就应该考虑人的这种特性，因势利导。小说就最符合人的这种品性。所以，如果正规史书不能起到开发民智的作用，那就应该用小说去开发。小说的社会教育功能超过六经、正史、语录、法律。

梁启超的主张发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到民国初年，小说创作极度发展，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坏作品，这是梁启超当初提倡小说所没有想到的。但是，梁启超并没有放弃早年的主张，在 1915 年发表了《告小说家》一文，大声疾呼，要求小说家们要有正义感，担负起社会责任，不去写对国家、社会、民众具有坏作用的作品，不去迎合社会上的低级趣味。他的论述较之早年只看到小说的正面作用而忽视其负面作用的偏向，变得全面圆融了。

4. 几部史学名著

有人说，在近代学术史上，梁启超和王国维都是不应死却早早就死去了的人。王国维死时只有 50 岁，梁启超死时只有 56 岁。不过，尽管他们去世的都比较早，却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梁启超曾经是整整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导师，他的著作由朋友林志钧编为《饮冰室合集》，分《文集》、《专集》两部分，共有 40 册之多，内容淹贯经史，参驳古今，涉及到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新闻、文化艺术、文字音韵、语言、小学、宗教等许多方面。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所写的几部史学名

著，如《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上面提过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都收在《专集》中。

《清代学术概论》是清朝的学术史，从顾炎武等人一直讲到他的老师康有为以及章太炎等人，对他本人也作了论述。这部书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必读书。

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做书名的著作共有两部，一部为史学家钱穆所著，一部是梁启超所著。这两部学术史，都是名著，影响很大。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叙述明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学术状况，内容包括经学、史学、哲学、文字音韵学、自然科学等，可以和《清代学术概论》结合起来阅读。

上面两部书都属于广义的近代史范围，《先秦政治思想史》则是不折不扣的古代史，详细阐述了儒、道、墨、法等思想流派的方方面面，提出许多独特的看法。

梁启超的著作全都议论风生，流利畅达，笔锋常带感情，引人入胜，所以阅读起来一点都不让人感到枯燥。

二 晚清史学革新的 先驱夏曾佑

1. 从西子湖畔到京师古都

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的夏曾佑（1863～1924），浙江杭州人，字穗卿，号碎佛，最常用的笔名则是“别士”。

“别士”这个名字，据梁启超说，出于《墨子》，与“兼士”对称。墨家叫“兼士”，非墨家便叫做“别士”。梁启超是心醉墨学的人，故号“任公”，又自命为“兼士”。夏曾佑自称不能做摩顶放踵利天下的人，甘愿听任墨家排挤，故自号别士。

夏曾佑自幼好学深思，稟性聪慧。一次，他偶尔在教会看到一本叫《谈天》的书，爱不释手。一位英国传教士便问他：“你年纪这么小，看得懂吗？”他回答：“懂”，这位英国人

便把书送给他。《谈天》是一部天文学译著，介绍了许多近代的科学知识和方法论，对晚清启蒙思想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

在接触西方科学与思想的同时，夏曾佑更多地是钻研中国传统典籍，这反映了晚清中西文化交汇背景下知识界的一般特征。梁启超说他和夏曾佑二人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

1890年6月，朝廷发布命令，赐他和文廷式等人进士及第。他当官了，但官小职闲，专心于读书治学，风流潇洒，思想活跃，积极进取，充满热情，成为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特别是他身处全国政治活动中心的北京，朋友多，信息灵，而才华又出众，所以显得非常扎眼，构成其生命中最闪光的一段。

2. 由“排荀，到”碎佛，，

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北京的知识界有过一段思想活跃时期。一批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从传统中走来，有了当时所能得到的最多最广的西方新知识新思想，好像小鸡破壳似的，奋争着想出世有所表现。他们时常聚会，谈古说今，恨不能道出自己的全部抱负，朦胧

地呼唤着一个新世界的诞生。夏曾佑参加了一些这样的政治与学术性沙龙活动，与杨锐、梁启超、汪大燮、沈曾桐等人互有来往。山雨就要来了，中国需要变化，夏曾佑赶上了这个好时机。

讨论中最使夏曾佑兴奋的，是今文经学中的公羊学问题，甚至有人把他比作今文经学家刘逢禄、龚自珍。他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呢？原来，这看上去是个学术问题，实质却是个政治问题，而且还是个现实政治问题。说穿了，他也想像康有为那样，做一位帝王之师。

他以史学家的眼光，今文经学的立场，与梁启超等人掀起一场“排荀”思潮，目的在于通过对先秦荀子的批判，清理整个中国学术史体系，打倒汉学，借古申今，为政治上的托古改制制造理论基础与历史根据，规划未来的社会发展走向。在致宋恕的一封信中，他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排荀”思想，说孔子的思想全叫荀子给搞乱了，他的任务就是去伪存真，擒贼擒王，先打倒汉学的老祖宗荀子，然后推倒当时垄断学界的整个汉学，恢复孔子的本来面目。这种从思想启蒙、学术考辨入手过渡到政治领域，慢慢带动社会变化与进步，避免革命震荡的改良思想，是他一生的基本主张，在细